DOI:10.13718/j.cnki.xdsk.2018.06.004

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孙晗霖[1,2],刘新智[1,2],刘　娜[2]

(西南大学 1. 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　要:针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攻克最后堡垒"的治本之策,提升已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农户生计满意度,是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抓手。选取重庆市酉阳县已脱贫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定量测定基础设施、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三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内容与"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间的内在关系,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条件对于脱贫户满意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生计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户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度。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生计满意度;扶贫攻坚工程;全民小康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8)06-0026-11

一、引　言

伴随着全面小康时间节点的不断迫近,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已进入了新一轮脱贫攻坚关键时期,但仍有超过 1 000 万贫困人口居住在深山、石山、荒漠、高寒、地方病多发等生存环境恶劣、资源极度匮乏、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上述地区贫困与生态环境、发展条件约束等问题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就地加快发展、脱贫致富,特别是改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大、周期长、投入高、见效慢,已成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最大难点,也成为阻碍全民小康进程的最大症结。2015 年,习近平提出要扎实推进"四个一批"扶贫攻坚工程,明确了易地扶贫搬迁在我国精准扶贫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年 12 月出台的《"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进一步强调要用 5 年时间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贫困群众,大力度实施易地搬迁工程,力争完成 1 000 万人口搬迁任务,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确保搬迁对象尽快脱贫,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帮助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1]。

脱贫攻坚要扭住精准,牢牢把握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要特别关注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问题,完成 2020 年战略目标只是扶贫工作的阶段性目标,中国的扶贫任务远没有结束,要真正实现"真扶

收稿日期:2018-06-10

作者简介:孙晗霖,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刘新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农村土地流转中三权分置权利关系及实现研究"(15BJY085),项目负责人:刘新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SWU1709402),项目负责人:孙晗霖;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准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实现机制研究"(18SKB019),项目负责人:刘新智。

贫、长久脱贫”，必须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靠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注重贫困群众的后续发展，若为追求短期效果而采用“短平快”的产业或临时性政策，扶贫方式过于简单化，脱贫基础不牢固，后续保障不到位，可持续性不强，忽视贫困户的心理诉求和生计需要，这可能在未来会造成严重的返贫问题[2]。本文基于微观视角，针对这部分既处于扶贫项目退出边缘，又存在抗风险能力脆弱和可能反复贫困的已脱贫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进行研究，是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科学评价和实施反馈，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现，是“扶真贫、真扶贫”的有益探索，切实解决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的“后续发展”问题，使得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真正“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避免精准脱贫成为自弹自唱的“独角戏”。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问题，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动力机制及作用机理、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与实现路径、扶贫绩效测度三方面。在扶贫搬迁的动力机制及作用机理方面，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贫困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非良性耦合，其实质是生态贫困，即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互为交织而形成的恶性循环[3-4]。环境变化或退化(沙漠化、石漠化)会直接导致那些依赖于环境生活的人们生存负担加重，甚至陷入贫困之中，当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只有迁移可以缓解人们的生计压力[5]。搬迁通过人口迁移和空间再造[6]，是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生态贫困而造成的常规扶贫手段不奏效的“环境难民问题(Environmental Refugee)”[7]，阻断资源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8]，破除“PPE怪圈(Pov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的重要途径[9]，能够有效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优势资源共享[10]，培育贫困人口自身造血能力，减少贫困基数，降低环境承载压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口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11]。在易地扶贫搬迁实施现状与实践路径方面，不少学者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目标选择不精准[12]、安置地缺口[13]、政策执行偏差[14]、补助标准不合理[15]、迁入地社会排斥[16]、脱贫能力不足[17]、后续保障不到位[18]等问题，应遵循“以人为本”基本原则，充分吸取搬迁群众的意见，创新瞄准机制[19]，建立灵活高效的财政支持体系，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和发展支撑产业[20]，选择实施差异化管理策略，加大配套保障设施建设[21]，重视知识扶贫、教育培训的内生发展推动力[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文化适应性，让移民进得来、住得稳、能发展[23]。在扶贫绩效测度方面，已有成果主要从移民效益数理模型、评估理论框架构建[24]、指标选择[25]、特定区域移民效益评价[26]等维度进行研究，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效益评估应体现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其评价指标应涵盖政策相关性、扶贫效率、扶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7]。上述文献表明，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有效实现形式之一，其减贫路径、作用机理、实施过程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现阶段有关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已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视角，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而对于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手段已达到脱贫标准的特殊贫困户及其生计满意度的相关研究尚少有。因此，本文在总结以往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是提高我国精准脱贫战略实施针对性的新探索。

(二)理论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主要适用于常规就地扶贫手段难以奏效的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这些地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差，自然资源匮乏，气候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旱、涝、洪、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乏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用地矛盾突出，土地出产量不高，当地农民生活能源短缺，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贫困与土地退化相关关系论”认为，人为生活所迫，会尽可能地从土地和环境中榨取更多的产出(掠夺式经营土地)，同时缺乏可投入的资本来改善生产条件，因而更加速土地和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由于收入偏低，当地群众缺少生活生产所必

需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由此造成“低收入→低资本来源→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28]。上述区域地理位置偏远，扶贫开发难度大，公共基础设施起步较晚、建造工期长、工程造价高，配套设施保障乏力，造成区域发展整体滞后、环境闭塞，通勤不便，即使拥有丰富的资源，也会因交通、电力、通讯、资金和技术等瓶颈的制约难以开发利用，无法给予当地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此外，徘徊在温饱线附近的贫困人口自身拥有的资源质量很低，缺乏足够的资产储备，致使其生产经营的边际效益较低，对于不利的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如遭遇疾病、意外、自然灾害等，会因无法抵御风险的冲击而陷入贫困，再加上贫困群众自身综合素质和自我脱贫能力较低，很难在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快速提高自身收入，完成一定的财富积累，改变陷入贫困的被动局面，从而导致该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存在反复性和波动性。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贫困群众的搬迁满意度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环境因素，特别是与其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环境[29]，《我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也将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列为了重点建设任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基本研究假设：

假设 H1：社会保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医疗、教育、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内容，其实质是对贫困群体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投资，为贫困人群的健康、发展和精神自给自足提供必要保障，规避“等要靠”等贫困文化[30]。从贫困人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社会保障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困难群众，是“稳得住”的基本要求，也是让贫困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现实需求。

假设 H2：基础设施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基础设施是地区间辐射的媒介，媒介的优劣决定了辐射的效率以及区域间经济互动力的大小，直接体现为区域内商品、要素流动的难易程度[31]。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推动区域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是地区发展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是易地扶贫搬迁“能发展，能致富”的重要基石。

假设 H3：产业发展对于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仅仅是脱贫的途径之一，已脱贫群众能否过上小康生活，关键在于荷包能不能鼓起来；荷包能不能鼓起来，关键在于农村产业能不能发展起来，这是一条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的链条[32]。没有产业支撑的扶贫工作，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持续的。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方法

易地扶贫搬迁本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而农户对于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实际是无法直接测量且主观性强的潜变量。回归方程无法准确估计潜变量间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则综合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处理潜变量测量误差的同时分析多因多果结构关系。因此，选取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方法展开对影响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主要因素的研究。

如下测量模型描述潜变量 η、ξ 与观测变量 Y、X 间的关系：

$$Y=\Lambda y\eta+\varepsilon$$

$$X=\Lambda x\xi+\delta$$

其中，Y 为 p 个内生观测变量组成的 $p\times1$ 向量；η 为 m 个内生潜变量组成的 $m\times1$ 向量；Λ_y 为 Y 在 η 上的 $q\times n$ 的因子负荷矩阵；ε 是 p 个测量误差组成的 $p\times1$ 向量；X 为 q 个外生观测变量组成的 $q\times1$ 向量；ξ 为 n 个外生潜变量组成的 $n\times1$ 向量；Λ_x 为 X 在 ξ 上的 $p\times m$ 因子负荷矩阵；δ 是 q 个测量误差组成的 $q\times1$ 向量；δ、ε 为 X、Y 测量误差构成的矩阵，不能由潜变量解释的部分。

结构模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表达式为：

$$\eta=B\eta+\Gamma\xi+\zeta$$

其中，B 和 Γ 为内生与外源潜变量的系数矩阵，ζ 为误差向量即回归残差，η 的残差向量。

(二)数据来源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集少数民族自治县、革命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一体，是重庆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贫困人口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也是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基数最大、贫困覆盖面最广的国家级贫困县，其贫困人口主要分布石漠化地区、高寒边远山区和深山峡谷地区，受山地地形和经济发展限制，其农村居民点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布局分散、区域分异明显的总体特征。自 2001 年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提出 2017 年实现“国家贫困县摘帽、贫困村整村脱贫销号、贫困人口越线”目标任务，仅 2016 年就实现 65 个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脱贫人口 6.57 万人[33]。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7 年对重庆市酉阳县四个镇、三个乡及四个村易地搬迁脱贫农户实地发放问卷调研所得，发放问卷 612 份，共回收问卷 558 份，共得有效问卷 548 份，有效率达 98.2%。调查问卷内容的设计包括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基本构成(表 2)和主体问卷(表 1)两个部分。主体问卷由 20 个测量指标构成，分别刻画社会保障、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计改善四个维度。文中各项观测指标是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选取，为了消除变量单位的影响，对各项变量进行了量化处理。

表 1　主体问卷

变量	指标	指标取值
社会保障	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度	1(无保障，16.1%)2(基本无保障，19.0%)；3(有部分保障，41.6%)；4(保障较大，22.3%)；5(保障极大，1.1%)
	医疗	1(没有效果，3.3%)；2(效果较小，12.0%)；3(一般，28.5%)；4(比较有效，52.9%)；5(非常有效，3.3%)
	义务教育	1(很不好，1.1%)；2(不太好，3.3%)；3(一般，16.4%)；4(较好，67.9%)；5(非常好，11.3%)
	金融便捷度	1(很不好，0.5%)；2(不太好，3.5%)；3(一般，10.2%)；4(较好，54.2%)；5(非常好，31.6%)
	治安情况	1(很不好，0.4%)；2(不太好，3.1%)；3(一般，18.1%)；4(较好，63.9%)；5(非常好，14.6%)
产业发展	农业生产环境	1(无提升，62.0%)；2(基本无提升，19.7%)；3(有部分提升，10.6%)；4(提升较大，7.3%)；5(提升极大，0.4%)
	是否有新兴的二三产业	1(是，27%)；0(否，73%)
	特色产业发展	1(未开展，57.7%)；2(有小规模的私人经营，20.4%)；3(有政府组织的大范围经营，21.9%)
	就业渠道	1(无提升，38.9%)；2(基本无提升，31.2%)；3(有部分提升，20.8%)；4(提升较大，8.8%)；5(提升极大，0.4%)
	就业环境	1(很不好，27.4%)；2(不太好，36.1%)；3(一般，28.1%)；4(较好，8.0%)；5(非常好，0.4%)
	技术培训	1(无指导，77.4%)；2(有指导但无效，8.0%)；3(有部分有效指导，12.0%)；4(有效指导较多，2.6%)
基础设施	垃圾处理	1(无改善，1.5%)；2(基本无改善，2.7%)；3(有部分改善，24.8%)；4(改善较大，49.5%)；5(改善极大，21.5%)
	交通便捷度	1(基本无改善，0.2%)；2(有部分改善，15.5%)；3(改善较大，60.8%)；4(改善极大，23.5%)
	水质	1(很不好，4.0%)；2(不太好，11.3%)；3(一般，19.3%)；4(较好，54.4%)；5(非常好，10.9%)
	空气	1(很不好，1.1%)；2(不太好，2.6%)；3(一般，2.6%)；4(较好，50.0%)；5(非常好，43.8%)
	电力条件	1(无改善，2.0%)；2(基本无改善，2.7%)；3(有部分改善，17.7%)；4(改善较大，55.5%)；5(改善极大，22.1%)
	通讯条件	1(无改善，1.8%)；2(基本无改善，1.8%)；3(有部分改善，20.8%)；4(改善较大，61.9%)；5(改善极大，13.7%)
生计改善	生计改善	1(没有改善，41.6%)；2(一般改善，37.0%)；3(明显改善，21.4%)
	政府搬迁工作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4.0%)；2(有点不满意，8.8%)；3(一般，19.7%)；4(比较满意，47.1%)；5(非常满意，20.4%)
	搬迁政策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0.7%)；2(有点不满意，1.5%)；3(一般，18.6%)；4(比较满意，56.2%)；5(非常满意，23.0%)

表 2　酉阳县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基本构成(%)

样本特征	样本特征值
性别	男(51.8);女(48.2%)
年龄	≦ 30(9.9%);31～40(19.3%);41～50(39.1%);51～60(18.6%);≧ 61(13.1%)
搬迁年限	3 年以下(66.4%);4－6 年(27.7%);6－9 年(5.9%)
户口所在地	板桥村(7.2%);大泉村(9.9%);官清乡(6.2%);李溪镇(22.6%);麻旺镇(9.1%);楠木乡(12.4%);双泉乡(4.4%);天马村(4.7%);永祥村(4.0%);酉酬镇(15.7%);苍岭镇(3.8%)

四、样本检验

(一)信度分析

为检验样本的可靠性,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对测量数据结果的信度(Reliability)进行评价。本次调查的总量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64,在 0.5－0.9 之间,表明此量表的可靠性较高。分量表即三个外生潜变量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6(表 3),说明问卷可靠,不必删除测量项目。

表 3　分量表信度系数

潜变量	Cronbach's Alpha	项数
社会保障	0.706	5
产业发展	0.686	6
基础设施	0.656	6

(二)效度分析

效度检验(Validity)主要检验潜变量下各测量变量间的收敛效度以及各潜变量相互区别的程度。测量项目为 22 个,样本数量为测量项目的 25 倍,符合因子分析对于样本数量的要求。对各要素量表进行KMO与Bartlett检验的结果(表 4)显示,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各要素量表的 KMO 值为 0.733,表示变量间具有相关性;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 2 725.279,自由度为 153 时达到 0.05 显著水平(P＝0.000＜0.05),拒绝虚无假设,即量表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素,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4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73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 725.279
	df	153
	Sig.	0.000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各要素量表提取成分(表 5),有 5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成分,它们累计解释了总方差的 58.154%,表明这 5 个成分能够较大程度地概括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因素。

表 5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3.788	21.045	21.045	3.788	21.045	21.045	2.609	14.496	14.496
2	2.531	14.062	35.107	2.531	14.062	35.107	2.489	13.826	28.323
3	1.727	9.592	44.699	1.727	9.592	44.699	1.982	11.010	39.333
4	1.381	7.672	52.371	1.381	7.672	52.371	1.942	10.790	50.123
5	1.041	5.783	58.154	1.041	5.783	58.154	1.446	8.031	58.154
6	0.925	5.140	63.294						
7	0.872	4.847	68.141						
8	0.823	4.571	72.712						
9	0.718	3.990	76.702						
10	0.696	3.869	80.571						
11	0.625	3.472	84.043						
12	0.589	3.272	87.314						
13	0.549	3.050	90.364						
14	0.458	2.543	92.907						
15	0.451	2.503	95.410						
16	0.346	1.921	97.330						
17	0.274	1.524	98.855						
18	0.206	1.145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由图 1 可知，前 5 个因子斜率较大，与其他剩余因子的区别度也较高，表明前 5 个成分能够较大程度地概括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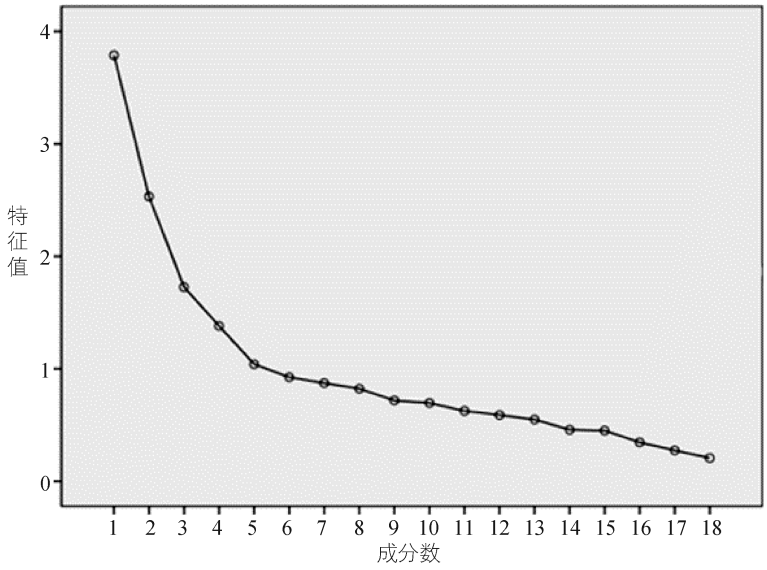

图 1　碎石图

进一步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要素量表进行直交转轴，转轴后的成分矩阵如表所示。张文彤[34]等认为若因子负载小于 0.3 时表明其对变量变异的解释不够，应删去该因子。本文以因子负载大于等于 0.4 作为删除的临界值，结果如表 6 所示。应删除新兴二、三产业两项，其余每个题项的因子负载均大于 0.4，说明收敛效度良好。同时，每一题项在其不所属成分中因子负荷量接近于 0，表明区别效度良好。

表 6　旋转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4	5
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度	0.129	0.089	0.765	0.107	0.183
医疗	0.554	0.005	0.084	0.266	−0.118
教育条件	0.547	0.252	0.109	−0.162	−0.124
义务教育工作	0.854	0.113	0.073	0.150	0.116
金融便捷程度	0.725	0.060	0.016	−0.040	0.067
治安情况	0.718	0.070	−0.011	0.015	0.085
农业生产环境	−0.010	0.068	0.045	0.628	0.041
特色产业发展	0.175	0.090	0.112	0.672	−0.127
新兴的二三产业	0.152	0.134	−0.068	0.087	−0.756
就业渠道	0.130	−0.027	0.685	0.331	0.069
就业环境	−0.040	−0.032	0.582	0.343	−0.038
技术培训	0.018	−0.082	0.241	0.725	0.142
垃圾处理条件	0.175	0.867	0.023	0.015	−0.022
交通条件	−0.021	0.576	−0.004	0.107	0.094
水质	0.061	0.194	0.128	−0.142	0.536
空气	0.113	0.068	−0.009	0.063	0.665
通讯条件	0.177	0.826	0.142	−0.096	−0.043
电力条件	0.016	0.740	0.084	0.004	0.049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收敛

(三)指标调整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重新修正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指标体系如表 7 所示。研究假设相应调整为 5 个假设，即公共服务状况、基础设施水平、就业条件、产业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对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有正影响(H1-H5)。

表 7　修正后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特征

变量	指标	变量特征
H1 公共服务	医疗(X1)	1(没有效果,3.3%);2(效果较小,12.0%);3(一般,28.5%);4(比较有效,52.9%);5(非常有效,3.3%)
	教育条件(X2)	1(无提升,5.1%);2(基本无提升,8.0%);3(有部分提升,12.4%);4(提升较大,61.3%);5(提升极大,13.1%)
	义务教育(X3)	1(很不好,1.1%);2(不太好,3.3%);3(一般,16.4%);4(较好,67.9%);5(非常好,11.3%)
	金融便捷度(X4)	1(很不好,0.5%);2(不太好,3.5%);3(一般,10.2%);4(较高,54.2%);5(非常好,31.6%)
	治安情况(X5)	1(很不好,0.4%);2(不太好,3.1%);3(一般,18.1%);4(较好,63.9%);5(非常好,14.6%)
H2 基础设施	垃圾处理(X6)	1(无改善,1.5%);2(基本无改善,2.7%);3(有部分改善,24.8%);4(改善较大,49.5%);5(改善极大,21.5%)
	交通便捷度(X7)	1(基本无改善,0.2%);2(有部分改善,15.5%);3(改善较大,60.8%);4(改善极大,23.5%)
	电力条件(X8)	1(无改善,2.0%);2(基本无改善,2.7%);3(有部分改善,17.7%);4(改善较大,55.5%);5(改善极大,22.1%)
	通讯条件(X9)	1(无改善,1.8%);2(基本无改善,1.8%);3(有部分改善,20.8%);4(改善较大,61.9%);5(改善极大,13.7%)
H3 就业	就业渠道(X10)	1(无提升,38.9%);2(基本无提升,31.2%);3(有部分提升,20.8%);4(提升较大,8.8%);5(提升极大,0.4%)
	就业环境(X11)	1(很不好,27.4%);2(不太好,36.1%);3(一般,28.1%);4(较好,8.0%);5(非常好,0.4%)
	基本生活水平保障(X12)	1(无保障,16.1%)2(基本无保障,19.0%);3(有部分保障,41.6%);4(保障较大,22.3%);5(保障极大,1.1%)
H4 产业发展	农业生产环境(X13)	1(无提升,62.0%);2(基本无提升,19.7%);3(有部分提升,10.6%);4(提升较大,7.3%);5(提升极大,0.4%)
	特色产业发展(X14)	1(未开展,57.7%);2(有小规模的私人经营,20.4%);3(有政府组织的大范围经营,21.9%)
	技术培训(X15)	1(无指导,77.4%);2(有指导但无效,8.0%);3(有部分有效指导,12.0%);4(有效指导较多,2.6%)
H5 自然环境	水质(X16)	1(很不好,4.0%);2(不太好,11.3%);3(一般,19.3%);4(较好,54.4%);5(非常好,43.8%)
	空气(X17)	1(很不好,1.1%);2(不太好,2.6%);3(一般,2.6%);4(较好,50.0%);5(非常好,43.8%)

五、实证分析

(一)测量模型验证与修正

为了检验因子内结构是否合理,即潜变量的测度项是否可以充分代表潜变量和问卷的综合信度及效度,需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对结构方程中的测量方程进行验证。采用 AMOS 软件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ML 参数估计方法,得出标准化因子负荷。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自然环境 5 个因子中,其指标因子负荷均大于 0.4,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各因子具有解释力。对假设模型拟合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RMSEA 低于 0.08,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基本大于 0.8,表明模型具有较好拟合效果,但 $3<X^2/df<5$ 表示模型勉强可接受,拟合优度较低,需适当调整(如表 8)。以 AMOS 输出的修正指数 MI(Modification Index)为基准,建立该值较高的基础设施中 e8 与 e9、e6 与 e7、e12 与 e13、e2 与 e10 间联系,且该关联符合理论意义,修正后的验证性因子模型如图 2 所示。修正结果显示:①所有测量指标的|t|值(即 C.R.)均大于 2.58,且方差的估计值均为正数,表明模型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内在质量佳。②观测指标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 0.4 标准值,各观测指标对潜变量均有较强的解释能力。③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评价标准(表 8),模型整体拟合优度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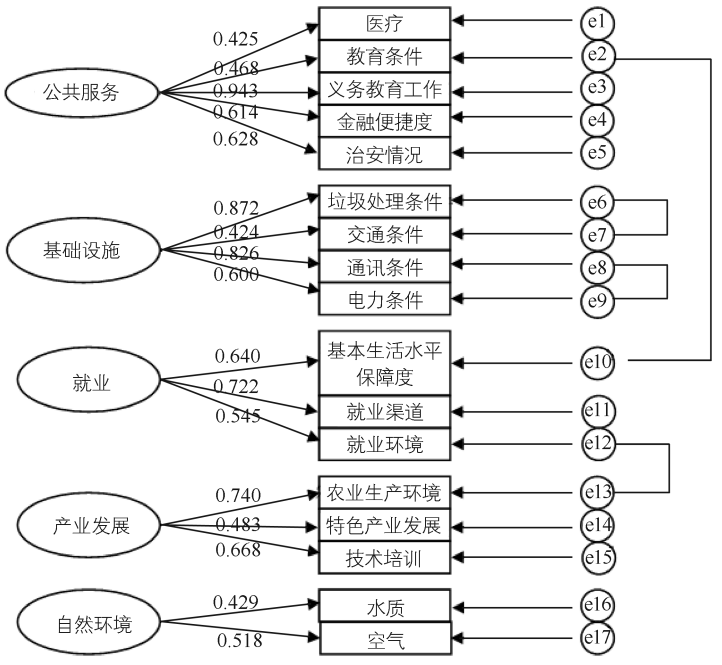

图 2　验证性因子模型

表 8　修正前测量模型拟合优度

拟合指标	X^2/df	GFI	AGFI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修正前	4.049	0.915	0.881	0.834	0.793	0.870	0.836	0.868	0.075
修正后	2.593	0.944	0.919	0.898	0.867	0.934	0.914	0.934	0.054

(二)结构模型验证与修正

为了考察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假设是否合理,需对结构模型进行验证。运用 AMOS 软件进行运算,主要依据 C.R.值及概率 P 值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对预设结构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C.R.<1.96,未通过 t 检验;多个整体适配拟合指标也不合格,这说明某些因素间影响路径存在偏差,需修正模型。本研究以实证结果为依据,通过增减路径的方法提高结构模型的拟合度。主要分为两步:删除参数异常与效应不显著路径,以修正指数 MI 较高与不违背 SEM 假定为基本前提,建立几个观测变量误差之间的共变关系,显著性程度 P 值增加。最终形成修正后的结构关系模型,各项指数达标,整体而言模型已达到理想拟合程度(如表 9 所示)。

表 9　修正结构模型的适配度分析

	绝对拟合度				增值拟合度				简约拟合度	
拟合指标	X^2/df	GFI	AGFI	RMSEA	NFI	CFI	IFI	RFI	PGFI	PNFI
一般标准	<5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最佳标准	<3	>0.9	>0.9	<0.06	>0.9	>0.9	>0.9	>0.9	>0.5	>0.5
修正结构模型	2.281	0.945	0.918	0.048	0.906	0.944	0.945	0.873	0.634	0.672

(三)假设检验结果

(1)在结构方程模型中,通常凭借考察模型的估计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以此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一般考察模型的估计参数主要是对路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如表 10 所示)。

表 10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参数结果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C.R.	P	Label	标准化路径系数
满意度	<—	公共服务	0.018	0.112	0.162	0.871	par_29	0.013
满意度	<—	基础设施	0.085	0.040	2.099	0.036	par_30	0.123
满意度	<—	就业	0.388	0.100	3.876	***	par_31	0.512
满意度	<—	产业发展	0.188	0.091	2.060	0.039	par_32	0.264
满意度	<—	自然环境	0.382	0.214	1.786	0.074	par_33	0.284

由表 10 可知，公共服务和自然环境对易地扶贫搬迁生计满意度均未通过 t 检验，且 P 值高于 0.05。说明公共服务的提高和自然环境的改善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H1 与 H5 假设不成立。

(2)模型中路径系数大小反映不同变量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由图 3 所示：①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均呈现正相关，即安置地基础设施越完善，就业机会越优越，产业发展环境越好，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的生计满意度越高。其中，就业对于满意度的影响最大，为 0.512，就业情况的改善能显著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满意度，其次是产业发展，为 0.264；②基础设施中 4 个观测变量中垃圾处理、通讯条件和电力条件的载荷系数较大，其值分别为 0.884、0.804、0.514，说明垃圾处理、通讯条件和电力条件的改善能够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农民的搬迁满意度，进而有效地促进易地扶贫搬迁顺利进行；③就业中指标变量基本生活保障度、就业渠道、就业环境的载荷系数均超过 0.5，说明这三大因子对提高易地扶贫搬迁户满意度的作用显著，其中，就业渠道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改善能较大程度提高其满意度；④产业发展指标中包含农业生产环境、特色产业发展、技术培训 3 个观测变量，其载荷系数分别为 0.736、0.501、0.653，说明安置地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技术培训能够较大程度提高已脱贫农户的生计满意度；⑤从满意度的角度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将生计改善作为评价其搬迁满意度的首要因素，生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满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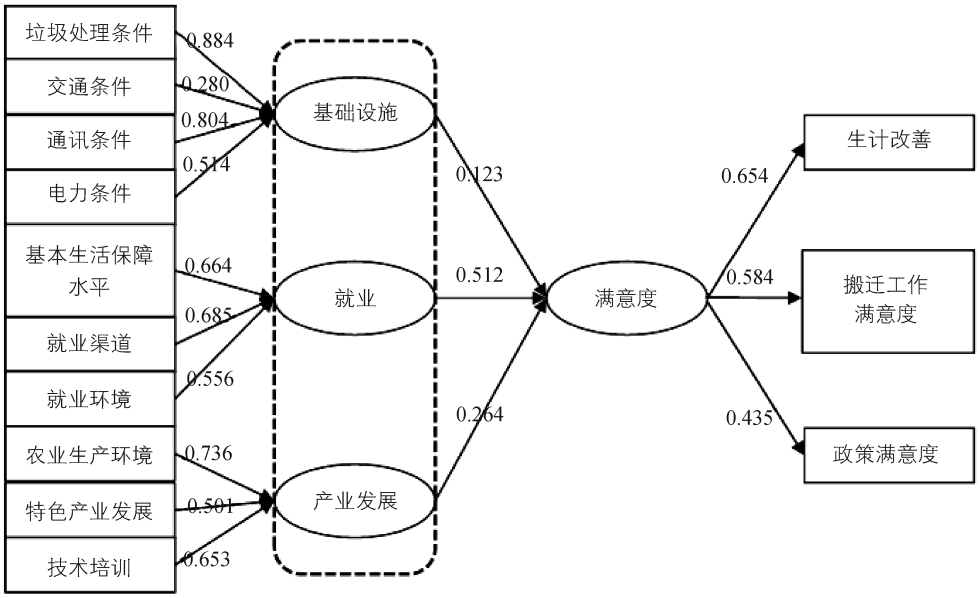

图 3　酉阳县易地搬迁脱贫农户生计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路径分析对 H1-H5 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社会公共服务与自然环境对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其他要素之间的路径关系与原假设所预期的一致，基础设施、就业、产业发展与易地扶贫搬迁已脱贫户的满意度有着密切关联，即 H2、H3、H4 假设成立，且就业对于提高已脱贫户的生计满意度作用显著，生计的改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工作的整体满意度。通过本文研究可得到如下启示：

(1)着力打好“就业”组合牌，确保已脱贫群众“稳得住”。搬迁仅为帮扶手段，要真正实现脱贫，还需要找准“就业”着力点，通过打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整合充沛的就业资源、拓宽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渠道和夯实就业保障措施来确保搬迁脱贫户能够“稳得住”，使脱贫群众有足够的机会享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易地扶贫搬迁脱贫过程中，各地应将帮助脱贫群众实现稳定就业为首要任务，大力开展针对性强的实用技能培训，提高培训工作实效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脱贫群众的自我发展

能力和创业就业能力。要精准分析当地劳动力结构，掌握点对点的就业需求，及时发布就业信息，搭建企业和搬迁群众供需无缝对接平台；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的劳务协作，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劳动力到外地务工，对安置地各类企业尤其是当地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用工需求进行全面调查，逐个企业对接落实就业岗位，优先安排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并做好后续回访工作，用就业帮助贫困户走上自主脱贫道路。介于困难主体专业基础薄弱，外部力量的刺激、激励与推动在短期内效果显现不足以形成可持续性自我发展能力的客观事实，各地应通过定期与按需相结合的在岗培训、继续教育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持续熏陶等方式，从根本上促使受助主体自身发生改变，使其有能力、有意愿结合外部援助进行自我发展。

(2)抓好“产业发展”，确保已脱贫户“能致富”。产业扶贫是贫困群众增收的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让广大贫困群众真正脱贫致富奔小康，“改善经济发展方式，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如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等”至关重要。要选择交通条件好，土地、旅游资源充足，产业发展潜力大的地点建设安置区，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和扶贫政策，找准路子，突显特色，创新方式，建立产业发展与困难群众增收脱贫联动机制。要根据资源条件，做好市场调查和特色产业局部，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养殖、加工、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项目，加强对市场好、附加值高、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项目的支持力度，对交通便捷、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醇厚、旅游开发价值大的安置点，要利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资源要素的重组和聚集，将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服务型安置区。要精心做好项目包装和运作，创新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方式，通过提供技术、经营、管理和市场保障，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切实做大做强扶贫产业，为搬迁户通过项目实现就业增收创造条件。同时，要坚持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以短补长、以长养短的产业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引导脱贫户发展短、平、快产业，做到长、中、短期产业相结合，确保搬迁脱贫户实现增收脱贫有渠道，今后持续增收致富奔小康有保障。

(3)加强“宜居”环境建设，提升脱贫群众幸福感。搬迁安置地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基本民生保障，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平台。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酉阳县易地搬迁工作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力度较大，但垃圾处理、通讯和电力等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缺位将严重影响居住地卫生，恶化居住地环境，损害当地群众身体健康，制约当地经济发展。为了适应搬迁群众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健康、持续、高速发展，保障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首先应着力提升安置点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消除垃圾污染对于安置地环境的威胁，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其次应着重完善安置地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多元化的互联网＋平台，打通信息惠民致富路，真正做到“保基础、强改善、惠民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良好外部环境，确保脱贫群众在新的环境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4)确保脱贫户“能发展”，进一步巩固脱贫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一系列问题，“搬得出”只是易地扶贫实施的第一步，能否可持续发展才是贫困户“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搬迁成效如何，要看脱贫群众是否得到了实惠，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脱贫是否有了支撑，以群众满意度检验脱贫成效，实证结果表明，要让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真正令脱贫群众满意，提高搬迁群众的积极性和认同感，需要帮有成果，扶有实效，切实改善脱贫群众生计状况。各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脱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遵循“集中力量、先易后难、统筹规划、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科学的“分步走”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责任，完善监督机制，扎实有效地做好各项工作，让搬迁主体看到希望、见到实效。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加大对安置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确保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优先保障搬迁安置区发展用地需要，惠民项目应向安置区

倾斜。此外，应集中优势着力解决安置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大宣传力度和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进市场主体，完善社会投入，整合脱贫资源，为扶贫企业开辟绿色融资通道，为扶贫产业发展搭建有效的载体和平台，切实保障脱贫群众就业增收，为贫困陷阱加上“防护网”，确保群众“脱真贫，真脱贫”，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Z]．发改地区[2015]2769号．

[2]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3] 佟玉权，龙花楼．脆弱生态环境耦合下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2)：47-51.

[4] AUNAN K，FANG J H，Vennemo H. Co-Benefits of climate policy-lessons learned from a study in Shanxi，China [J]. Energy policy，2004，4：567-581.

[5] BURTRAW D，KRUPNICK A，PALMER K. Ancillary benefits of reduced air pollution in the US from moderate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policies in the electricity sector[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3：650-673.

[6]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7] 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102-103.

[8] BOANO C，ZETTER R，Morris T. Environmentally displaced people：Understand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livelihoods and forced migration[R]. Refugee studies centre policy brief，No.1 (RSC：Oxford)，2008.

[9] GRANT J P. The state of the world' s children[M]. New York：UNIC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65-68.

[10] 王桂芬．生态移民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对贫困村瞄准效率的实证研究——来自宁夏农户的调查分析[J]．生态经济，2010(11)：48-51.

[11] ALI I，ZHUANG J. Inclusive growth toward a prosperous Asia：policy implications[J]. No. 97. 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7：1-19.

[12] 彭玮．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湖北省的调研分析[J]．农村经济，2017(3)：26-30.

[13] 常艳．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土地安置能力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6)：155-158.

[14] 何得桂，党国英．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119-123.

[15] 王永平，袁家榆，曾凡勤，陈妮．欠发达地区易地搬迁扶贫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讨——从贵州扶贫主题调研引发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8(1)：208-210.

[16] 邢成举．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省证据[J]．改革，2016(11)：65-73.

[17] 苏维词．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区开发式扶贫的模式与长效机制[J]．贵州科学，2012(4)：1-5.

[18] 顾仲阳．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四大创新战贫困[N]．人民日报，2014-3-11.

[19] 李小云，唐丽霞，许汉泽．论我国的扶贫治理：基于扶贫资源瞄准和传递的分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7)：90-98.

[20] 王志章，孙晗霖．西南地区新型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6(1)：74-77.

[21] 李培林，王晓毅．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J]．宁夏社会科学，2013(5)：52-60.

[22] 王志章，刘天元．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与破解路径[J]．农村经济，2016(5)：74-79.

[23] 杨甫旺．异地扶贫搬迁与文化适应——以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08(6)：127-132.

[24] 张焱．扶贫开发效益评价的数学模型[J]．管理科学，1995(1)：58-61.

[25] 孔令强．易地开发性移民扶贫及其效益评价指标体系[J]．学术交流，2006(7)：75-77.

[26] 东梅．生态移民与农民收入——基于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3)：48-58.

[27] 高波，王善平．财政扶贫资金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4(5)：86-89.

[28] SOLTANI A，Angelsen A，Eid T，et al. Poverty，sustainability，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Zagros，Iran[J]. Ecological economics，2012(7)：60-70.

[29] 陈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J]．探索，2017(4)：153-158.

[30] 朱玉春，唐娟前，郑英宁．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1478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0(2)：82-90.

[31] 童中贤，曾群华，马骏．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增长极培育的战略分析——以武陵山地区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0(4)：85-96.

[32] 史俊宏．非自愿生态移民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94-99.

[33]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酉阳调查队．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7-12]．http://youy.cq.gov.cn/html/content/17/07/39018.shtml.

[34] 张文彤．Bootstrap方法在Cox模型参数估计中的应用[J]．中国公共卫生，2002(9)：121-122.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